

谭嗣同文选注

周振甫选注

中华书局

谭嗣同文选注

周振甫选注

中 华 书 局

1981年·北京

2006/5

©

谭嗣同文选注

谭嗣同著

周振甫选注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8¹/₄ 印张·193千字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册

统一书号: 2018·164 定价: 0.93元

前 言

一 谭嗣同的生平和时代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自署东海襄冥氏，湖南浏阳人。生于1865年（同治五年丙寅），死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三十四岁，他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改良主义变法运动中最激进的人。他在《仁学》中所阐发的有些论点，象“求为陈涉杨玄感……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即提倡效法陈涉起义和暗杀，已经超越了改良主义，为资产阶级革命制造舆论；他猛烈地攻击封建伦常，比早期《新青年》上的批孔更为深刻。

他出身封建官僚家庭。父继洵，官做到湖北巡抚。嗣同十二岁死了母亲，受由父妾扶正的后母虐待，尝尽苦楚，对封建伦常的毒害感受极深。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嗣同三十岁，碰上中日甲午之战，他感到国家的危亡，思想上发生剧变，抛弃旧学，发愤提倡新学，号召变法。下一年，在湖南组成算学社，讲求新学。1896年，他三十二岁，听说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办强学会，慕名往访，见到梁启超，^[1]听到了康的讲学宗旨和变法条理，认为与自己想的十同八九。^[2]十二月，强学会被清政府封闭，他对此极为愤慨。这年，他奉父命，纳资为候补知府，在南京候补了一年，看到了官场的黑暗，更加强了变法的信念。这时他从杨文会学佛学，闭门读书，把儒学、佛学和他能获得的西学知识结合康的一些理论，著《仁学》一书，替变法制造舆论。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嗣同三十三岁。从南京回到长

沙。他和陈宝箴、黄遵宪、唐才常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又创办内河小轮船、矿务局等。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嗣同三十四岁。他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在长沙成立南学会，宣传新学，培养人才，兼学会与地方议会的规模。又和唐才常等创办《湘报》。湖南新政的建立，遭到顽固派的猛烈攻击。湖广总督张之洞电令陈宝箴、黄遵宪制止《湘报》发行。嗣同极为愤慨，曾经感慨道：“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3]他这时已抱有为变法维新而牺牲的决心。

这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下了定国事的诏书。学士徐致靖保举嗣同。七月，嗣同带病入京，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参预新政，称军机四卿，担任拆阅章奏、起草上谕的工作。戊戌维新，从四月二十三到八月初六日的一〇三天中，光绪帝只是为变法颁布了几十道诏令，军政大权都掌握在顽固派首领慈禧太后手里，维新派不能真正有所作为。光绪帝在甲午中日之战惨败后，想引用新人来进行变法，从而加强自己的权力，摆脱慈禧的控制，便在这年四月二十五日，通过师傅翁同龢的推荐，召见康有为参赞新政。慈禧即在二十七日罢黜翁同龢来对光绪帝进行警告，并任荣禄做直隶总督，掌握军政大权，准备废立。七月二十七日嗣同主张开议院，光绪帝接受康有为建议，命嗣同起草诏书，开懋勤殿设顾问官，于二十八日向慈禧请示，二十九日即赐康有为密诏，说“朕位幾不保”。嗣同主张邀新建军督办袁世凯相助，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赏侍郎衔。初三日，嗣同夜访袁，约定由袁杀荣禄，除旧党。初五日，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初六日慈禧再度训政，幽光绪帝于瀛台。初十日，嗣同与康广仁、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等被捕，十三日嗣同等六人被杀。嗣同在七月十八日入京，到八月初六日政变，前后只有十七天，就为维新而牺牲了。在他被捕前的初九日，几位日本人力劝嗣同

去日本避难，嗣同不听，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4]他的壮烈牺牲，宣告改良主义的彻底失败。

谭嗣同在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四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年。他的短促的一生所经历的，正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时代，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酝酿时期。当时国内的政治舞台上主要有三派：一派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代表地主官僚的利益，顽固地要保持封建统治。一派是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代表地主官僚和买办的利益，热心于练新军、办机器厂等来维护封建统治，反对变法。一派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代表从开明地主和富商转化过来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发展工商业，取得有限度的民主权利。但是，当时中国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还很薄弱，远远比不上帝国主义在中国办的工业或官僚买办工业，在政治上表现出它的软弱性来。加上他们跟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害怕人民群众，不敢真正触动封建统治阶级，对帝国主义存在种种幻想；而顽固派掌握大权，同洋务派结合，投靠帝国主义，确立了强大的反动统治机构，这就决定改良主义的失败。强学会的被封闭，《湘报》的禁止发行，不过是维新运动失败的前奏而已。

二 谭嗣同的三期思想

谭嗣同从小受的是封建教育，加上数学和自然科学。后来从欧阳中鹄和刘人熙学，读王夫之的《船山遗书》。二十九岁，他在上海，购到广学会译出的外国历史、地理、政治和耶稣教的书籍，努力追求西学知识。这个时期的思想，以二十五岁写的《治言》和三十岁以前写的《石菊影庐笔识》为代表。三十岁时，受到了中日战争惨

败的刺激,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这期的代表作品,是三十一岁写的《兴算学议》和《思纬氤氲台短书》。三十二岁,嗣同受到了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影响,接受了杨文会的佛学思想。这一期的思想,他的代表作是三十二岁作的《北游访学记》和三十三岁完成的《仁学》。

第一期思想:见《治言》和《石菊影庐笔识》。嗣同称《治言》“务为尊己卑人、一切迂疏虚侨之论”。他称中国为华夏,列强为夷狄。他认为“夷狄之加乎华夏,夷狄之由忠而质且向乎文,而适当华夏之文胜质不存也”。他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忠、质、文到忠、质、文的循环论,中国已经发展到文,趋向浮华。列强正发展到质,即质朴,浮华不敌质朴,所以中国老是失败。但列强的“文非文,则质亦非质,忠亦非忠”,他们的忠质文并非真的忠质文,是“皆其似焉者”,即貌似忠质文,所以他们的将来由质而变到文,“俗浇则人自为心而民解裂”,“则所举皆废而国以不国”,就要趋向灭亡;中国的忠质文是真的忠质文,“华夏固可返之于忠”,只要从文回到忠就行了。“夫不自欺,忠也。”他认为只要不自欺,就可以做到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他认为“道之不可变者,虽百世而如操左券。”但他又指出当时和、战、守都不行,“势在必变”。原来他认为由忠质文到忠质文的循环论之道是不变的,但中国已经到文,要由文变到忠,这是必变的。因此,他同顽固派的反对变不同,是认为必变;同洋务派的只要向西洋学些船坚炮利和有关工业就够了的观点也不同。他认为“以战之具,若测算,若制造,亦志士所有事,要之华夏之以自治者则皆不在乎此”。他认为洋务也要,但主要不在讲洋务。那么怎么变呢?“反天下扰攘者一于礼,而后风俗敦,风俗敦而法乃可均。”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他认为西洋“惟其出一令而举国奉之若神明,立一法而举国循之若准绳,君与民相联若项领,名与实相副若形影。先王之言治,曰道一而风同,道非道而固一,

风非风而固同，斯其忠质之效。”这里，表面上是否定西洋“道非道”而“风非风”，骨子里是赞美西洋“道一而风同”，要中国学习西洋这一套，做到道一风同，收“忠质之效”，然后“俗敦而法乃可均”。那末他同维新派也不同，维新派要变法，他不讲变法，要变人心风俗，所以归结到“出治者先自治为尽己”，要统治者先自治再来改变人心风俗，要统治者从诚意着手做到天下平，这是保守的。他当时还没有看到资本主义超过封建主义，还认为道不可变，但他已认识到“势在必变”，所以再进一步，就走到维新运动方面去了。

在《石菊影庐笔识》里，他的思想比《治言》有些发展，但还有一致处。《思篇》十五里宣扬了进化论，认为“中国日弱而下，西洋日强而上”，中国就有被淘汰的危险，所以对于“测算制造农矿工商者”，要“深察而殊旌之”，要特殊奖励农矿工商，这已接近维新派的论点了。但他还是认为“中国圣人之道，无可云变也”。认为道不可变。《思篇》二十八：“气行于五官百骸，形而为视听言动，著而为喜怒哀乐，推而究之，齐治均平所由出也。”先说精神现象决定于物质的气，但又把治国平天下都说成是个人的气的作用。《思篇》十四以“天地非幻，即声光亦至实”，来反对“释氏之末流，灭裂天地，等声光之幻，以求合所谓空寂。”批判佛教的虚幻。但《思篇》八又认为“是知天地万物果为一体，心正莫不正，心乖莫不乖，而决无顽空断灭之一会，此君子所以贵平和也。”又把心和物混淆了。这些论点都有和《治言》一致的地方，其中也有同维新派更接近的地方。

张德钧同志指出：“他这时对于帝国主义列强颇持有高度的警惕性。他在读魏源的《海国图志》时，批评以夷攻夷的主张说：‘夫不能自振而恃援于人，亦已萎矣。所恃者而又欧人也，欧之与欧复奚择焉？逞一朝之忿而忽百年之忧，规眉睫之利而暗旋踵之害！’而后之论者犹曰以夷攻夷，则何其昧于计也。”指出“这种卓识”“在他的思想上没有得到巩固，只是昙花一现。”^[5]这是完全正

确的。

第二期思想：见《兴算学议》、《思纬氤氲台短书》。《兴算学议》就是《上欧阳瓣菴师书二》。信里提到兴算学，欧阳中鹄就把这信和另拟的《算学社章程》合刊成《兴算学议》。嗣同说：“间有未尽，复于《报贝元徵书》详焉。”^[6]《报贝元徵书》就是《思纬氤氲台短书》，因此，《短书》里已经包括了《兴算学议》在内。这两封信都是在甲午中日之战惨败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嗣同三十一岁时写的。当时他受到甲午战争惨败的刺激，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他“当愤而忘食，既寐而累兴，绕室徬徨，未知所出”，“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7]这跟他接受了王夫之的“器体道用”的唯物观点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的思想有关，跟他在二十九岁时遍读广学会译出的外国书有关，跟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一下战胜中国有关，加上中国民族工业已经产生和发展，嗣同在这年春天，与湖南士绅集股筹开煤矿，他已经从地主阶级转变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要为发展资本主义而主张变法了。

这期思想跟第一期不同的地方，表现在：第一，在《治言》里提出“而道之不可变者”，在《短书》里却提出“器体道用论”，指出“无其器则无其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指出“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至于法，是“道之消殒而蕃变者”，“与时为变”。当时的时代既是数千年未有的巨变，时和器都变了，道和法也不能不变。第二，《治言》是“尊己卑人”，称列强为夷狄。《短书》是尊人卑己，认为西洋的一切都胜过中国：西洋的民主，远胜中国的尊君卑臣；西洋的父子兄弟分居，远胜中国的子女转累父母，妇姑争吵，兄弟争产；西洋的一夫一妻，胜于中国的妻妾妒争，嫡庶猜忌；西洋的尊天明鬼，远胜中国的度祀多神；西洋法度博大精深，中国几乎无法。因此力主全变西法。把变科举同变学校相配合，学校专讲各科实学，科举选拔学校中培养出来的人才加以任用，实行

变法,要大办学校,大开议院,改官制,精求工艺制造,兴办商务,去弊政,兴利源。《治言》里不反对洋务派,《短书》里反对洋务派。他认为洋务派只看到轮船、电线、火车、枪炮、机器,这些是枝叶,没有看到根本的法度政令之美备。由于洋务派没有科学,所以连枝叶都学不到。

这时期,嗣同的全变西法有几点是突出的。一、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出发,揭露清王朝是变法的阻碍者,提出满汉的民族矛盾,远较康有为等所说的“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激进。他在《兴算学议》里说:“及睹和议条款,竟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又加注道:“满汉之见,至今未化,故视为僥来之物。”“宜乎台湾之民,闻见弃之信,腐心切齿,以为恩断义绝,开辟以来无忍心如此者!”“中国之生死命脉,惟恐不尽授之于人!非惟国也,将含生之类无一家一人之不亡!”强烈控诉清王朝出卖台湾,出卖中国,出卖全国人民的罪恶。又说:“庚申可变矣,己酉可变矣,而决不变!”指斥清王朝顽固反对变法,结果“可使四百兆黄种之民,胥为白种之奴役!”这里已经酝酿《仁学》中强烈反对清王朝的思想。二、已经开始揭露封建纲常的弊害。在《短书》里指斥君臣一伦为“尊君卑臣”,是“以隔绝不通为握固之愚计”。揭露封建家族制度,造成“妇姑勃谿”,“骨肉争产”,“夺嫡争继”,“嫡庶猜忌”。这里已酝酿《仁学》中反对封建伦常的理论了。

这期思想里还保留着上一期的旧观点的:一、《兴算学议》里指出要“使孔孟程朱之传不坠于地”。在《短书》里说:“夫惟仁,是以相人偶;夫惟义,是以能制事;夫惟礼,是以有《周官》之制。”说明他还是要继承孔孟程朱的道统,继承孔孟宣扬的仁、义、礼。这就形成《仁学》中提倡“仁”、赞扬孔学的落后面。二、《治言》强调要改变人心风俗,《短书》里提到“正人心”,认为“是固根本之根本,而亦第正在上位之人之心可矣。”但对这点只是附带提一下,重点放在变法,

跟《治言》的着重讲诚意不同。到《仁学》里,要用心力来挽劫运,那就倒退了,但它的根子还是从“正人心”来的。这期思想比前一期倒退的,还有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前一期批判了魏源的以夷制夷,这期却提倡以夷制夷,在《短书》里荒谬地提出把祖国大片领土卖给外国,以“结其欢心”,“浼二国居间,胁日本废去遍地通商之条约”。说明他对帝国主义认识的模糊。

第三期思想:见《北游访学记》《仁学》。嗣同于三十二岁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到北京,到六月出京。他在《记》里说:“去年底到鄂,意中忽忽如有所失,旋当北去,转复悲凉。”嗣同在《短书》和《兴算学议》里提出“河西吴越以保民为心”,提出地方自行新政的计划既不行;于是执行兴算学议,“自变其学术”,办学校来讲新学,培养人才,在浏阳兴办算学格致馆,“事垂就而阻者大起”,^[8]并未成功。他的志愿无法实现,因而感到悲凉。遂发一宏愿,“愿遍见世间硕德多闻之人,虚心受教。”他先到上海,看到傅兰雅,听到有新法“能测知人脑气筋,绘其人此时心中所思为何事”。他相信了这种神话。“因念人所以灵者,以心也。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者”。人与人“以心相战”可造成劫运,诚心可以感人。“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于是要“以心挽劫运”。这又回到《治言》里用诚意来治国平天下了。他在京又晤讲佛学者吴嘉瑞(雁舟)、夏曾佑(穗卿),于是发大愿,“昼夜精治佛咒”,想用他的诚心,通过佛咒来感动所有的人,只要所有的人受到感动就可以挽救劫运。他认为“此发一善愿,彼必有应之,如寄电信然。”这就是他在《仁学》里大讲佛学,要用心挽劫运的由来。吴嘉瑞说:“西人虽日日研求枪炮”,但“彼教灵魂之说,足以竦动其心,遂蠢蠢(犹勉力)于善也。”这是他在《仁学》里宣扬耶稣教,美化帝国主义的由来。此外,《记》里批判君臣一伦的黑暗,在《仁学》里有进一步的发展。

再来看《仁学》，它提出中国“大劫行将至矣”，认为这是人心多机械造成的，要“以心解劫运”（三九节）。“先去乎自己机心，重发一慈悲之念”（四十节），“以感天下而劫运可挽”（四二节）。他通过佛学，说明怎样去机心，发愿力，挽劫运，就是从傅兰雅那里接受《治心免病法》，从杨文会那里接受佛学来的。《仁学》里荒谬地赞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说：“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认为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绵延长夜，丰蔀万劫，不闻一新理，不睹一新法”，要逐步退为“荒荒大陆”。并赞美日本的侵略为“日本之胜，则以善仿效西国仁义之师，恪遵公法”（三二节）。这是接受吴嘉瑞美化帝国主义错误论点的发展。他没有认识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仁学》还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嗣同在三十二岁时去北京，和梁启超相识，听到了《大同书》的理论，称赞康有为“传孔门不传之正学，阐五洲大同之公理，三代以还一人，孔子之外无偶，”^{〔9〕}极为推崇。《大同书》主张“破除九界”，表面上同《仁学》“冲决网罗”相似，其实是不同的。康讲的“破除九界”，认为是将来的理想，现在不可能做到；谭讲的“冲决网罗”，有的是当代的急务，象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君主、伦常之网罗；有的是将来的理想，象冲决天之网罗，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仁学》里讲到进入大同世界，要损体魄益灵魂，就是受到《大同书》里“炼神养魂之道”的消极影响。

《仁学》里还有一个来源，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象主张“日新”，“去故”“取新”，反对“好古”（十九节）；主张动，反对静；主张奢，反对俭（二一节）；主张惜时，反对浪费时间（二二节）；主张“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二六节），宣

扬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所谓博爱、平等、自由。这部分是反对封建思想,宣扬资本主义思想,为变法维新制造舆论,在当时是有进步作用的。

三 谭嗣同思想的杰出成就

谭嗣同在《仁学》里所表达的思想,除了接受别人影响的部分,象上面所指出的以外,有从旧垒中来,反戈一击易制敌人的死命的,象他对于封建伦常的猛烈的抨击;有受到中日战争惨败、割让台湾的切齿腐心的痛愤,对清王朝进行猛烈的抨击,发展到提倡起义、暗杀,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这就在理论上超出了改良主义,进入了革命民主主义。这些是谭嗣同思想的杰出成就。

《仁学》里指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则赖乎早有三纲五伦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二十八节)从君主制的罪恶推论到民族压迫,“然而有知辽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接下来把矛头指向清王朝,“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过去是这样,现在“外患深矣,海军熠矣,要害扼矣,堂奥入矣,利权夺矣,财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亡,而卒坚持不变!”那就要造成亡国灭种之祸,为了救亡图存,就非推翻清王朝不行。“乃犹道路以目,相顾而莫敢先发,曰畏祸也。”其实“天命去则虐焰自衰,无可畏也。”“以时考之,华人固可以奋矣!且举一事而必其事之有大利,非能利其事者也。故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

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号召汉族人民举行起义，推翻清王朝，并为起义而牺牲。要是时机不成熟，不如进行暗杀。

这样反君主专制，反对清王朝，号召起义和暗杀，很快被革命派所接受。“如1907年《民报》临时增刊，章炳麟编的《天讨》，其中《讨满洲檄》《普告汉人》所控诉清朝反动统治者的罪行，就大体跟《仁学》相同。而革命党人中第一个发出反满强声的邹容所著《革命军》，则连《仁学》的文句也照抄了许多。”“陈天华著《猛回头》，称谭嗣同是‘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最有影响的宣传反满的《黄帝魂》，更把《仁学》的反满言论全部抄录进去，题为《君祸》。烈士吴樾著《暗杀时代》，引‘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接着说：‘至哉言乎，可谓明于时事者矣。’”“所以有人把谭嗣同列为‘兴中会时期前半期之革命同志’，就其思想之主要倾向而论，是合理的”。^[10]

《仁学》里强烈地反封建伦常，指斥几千年来的名教，造成“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积以威刑，箝制天下。”于是在下者的被屠戮，还不如“孤豚之被摯缚屠杀也，犹奋荡呼号”，而被害者还给加上“得罪名教”的罪名，“衔冤饮恨于万古之长夜！”（八节）这样的纲常名教，使在下者变成“卑谄侧媚，奴颜婢膝”，在上者“自放纵横暴而涂铄天下之人心”（二七节）。这种学说，到了宋朝，更是“惨鸷刻核，尽窒生民之灵思。”“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村女里妇，见戕于姑恶者何可胜道！”“后母之于前子，庶妾之于嫡子，主人之于奴婢，”“而黑暗或有过此者。”夫妇之道苦，“直于家室施申韩，闺闼为岸狱。”“彼君主者，独兼三纲而据其上，父子夫妇之间，视为锥刃地耳”。（三四节）这样大声疾呼攻

击纲常名教，指斥它的惨酷屠戮，指斥在纲常名教统治下的万古长夜，它的深刻性已经超过了早期《新青年》上的批孔了。

《仁学》里强烈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惨祸烈毒，深刻地指出这是由于封建伦理的三纲五常，君臣一伦尤为黑暗无人理。这里抓住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的根源在于三纲五常。这点在早期《新青年》上的批孔文章里没有看到。吴虞在《新青年》二卷六号《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里大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是完全正确的，是有革命精神的。但指出封建专制建立在家庭专制上面，说：“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把孔子的提倡孝弟，说成是封建专制的最大祸根，从而得出“盗丘之遗祸在万世”，“国愿之流毒遍天下”，认为孔子成为万代的祸害。他在《新青年》三卷四号《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里说：“盖孔氏之徒，湛心利禄，故不得不主张尊王，使君主之神圣威严不可侵犯，以求亲媚”，把君主之神圣不可侵犯说成是孔子的尊王造成的。这些论点，都远不如谭嗣同指出封建专制主义的祸根来自三纲的君臣一伦为正确。家族制度并不是专制主义之根，自从中国半殖民地化以后，大家族制度、三年之丧等家族制度已经解体，但封建专制主义并没有跟着动摇，所以说家族制度是专制主义之根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的。《春秋》尊王，但对周天子的违反礼制是有贬辞的，没有把天子的权力绝对化。《论语·宪问》：“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子是反对顺着君主，主张犯颜谏诤的。三纲之说始于韩非，他在《韩非子·忠孝》篇反对“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把“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一定要绝对顺从说成是“天下之常道”，是不可变的天经地义，这才建立了三纲，把君权绝对化，替秦始皇的封建专制主义制造舆论。君成了纲，自然产生父为子纲，因而李斯赵高假造圣旨，逼太子扶苏自杀，扶苏连请示一下都不敢，所以不是孔子讲的孝弟造成封建专制主义，而是韩非

把君权绝对化造成封建专制主义，父权和夫权是从君权绝对化里派生出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实行封建专制主义，到了西汉末年产生的纬书《礼纬含文嘉》里，有人就根据韩非的理论，概括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范文澜同志在《文心雕龙·正纬》里指出：“讖纬本非儒家之言，故古文家不道。”纬书里提出的三纲是从韩非来的。吴虞把封建专制主义的祸根说成是孝弟或《春秋》的尊王，远远不如《仁学》里指出封建专制主义的惨祸烈毒由于三纲的正确。《仁学》里指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这是抓住封建专制主义的要害，是经过二千年来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实践检验、经过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践检验而得到证明的。要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一定要反对君为臣纲，反对君权绝对化。孔子主张对君主“勿欺而犯”，要求说真话，要求犯颜谏诤，那一定要反对君权绝对化以后才能办到。所以《仁学》里抨击“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把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首先指向秦政。这些，不都远远胜过吴虞吗？

毛主席指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嗣同在这里，极力冲决封建的政权、族权、夫权，已经突破改良主义进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什么在神权前停步不前，终于作了宗教的俘虏呢？这正说明当时刚在生长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非常薄弱，他虽号召起义，却找不到起义的力量。那他说的“求为陈涉杨玄感”，不免成了空话，只能依靠上层来进行改革，只能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了。他虽然同情兵勇被清王朝所屠戮，却不敢象革命派那样去联络兵勇来发动起义。他更害怕人民的起义，在《兴算学议》里认为“看来内乱防不胜防”，主张“练兵以防内乱”。那他只有投靠宗教，想凭心力来挽劫运了。所以得到光绪帝

的召请，与他的妻子李润信说“皆平日虔修之力”，即认为他“昼夜精治佛咒”，感动光绪帝回心转意了。他终于为维新牺牲，造成了悲剧。

嗣同的三期思想，有它始终不变的观点，即强调心的作用和变法。这是他的软弱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的地位决定的。因为他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要变法；因为太软弱，所以只能靠心的作用。他早期要以诚意来救国，在第二期以正在上之人之心为根本之根本，到第三期的以心力挽劫运，都是强调心的作用，是一脉相承的。另一点，他的第一期思想虽然也讲到变，但那只是要求人心风俗的变，不是变法。第二期才主张“尽变西法”。第三期的宣扬民主和科学，还是学西法。他的三期思想又有随时变化的，还没有摆脱地主阶级的立场，所以宣扬忠质文的循环论，归结到诚意，是保守落后的。转向资产阶级，提倡“器体道用论”，要“尽变西法”，是进步的。由于苦闷而找不到出路，投向佛教，要以心力挽劫运，是错误的。但反对君权，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伦常，是从旧垒中来，从封建黑暗统治的实际生活斗争中来，这部分政治思想是进步的。他由于脱离群众，落到以心力挽劫运，是错误的，所以终于造成变法而牺牲的悲剧，用他的行动来证实他还没有真正超越维新派。

〔1〕汤志钧同志指出：“谭、梁初晤，梁启超《谭嗣同传》《饮冰室诗话》均志乙未（1895年），细加检核，实有未安。乙未，谭未北游。梁谭相晤之最早记载，为戊戌政变后粤督谭钟麟于康有为家中抄出的《梁启超与康有为书》，中云，谭‘因铁樵（吴樵）相称来拜’，则谭梁相晤，经由吴樵介绍。查吴于乙未十月廿四日抵津，廿九日到京。十一月十二日吴樵《致汪康年书》：‘十二日，赴强学会议事之约，略坐即去，以无可言者。伯康（汪大燮）、卓如（梁）甚好。卓如以与诸人所论不合，拟辞职矣。’（手札，上海图书馆藏）是谭梁相晤，不得早于乙未十一月。丙申三月十三日，吴樵《致汪康年书》：‘谭复卿精锐能任事，不可多得之员，初不意此君能如是也’（同上）。是吴之遇谭，在丙申三月，梁